

中拉关系

## 中国对拉美的文化传播：文学的视角<sup>\*</sup>

楼宇

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中拉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日益密切，发展相对滞后的文化关系也被迅速提上政策日程。就中国而言，发展对拉文化关系既有助于中拉民心相通，也有助于增强中国在拉美的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国在拉美的国家形象。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加强中国文学对拉传播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最普遍、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本文在阐述文化软实力和文学交流关系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中国文学作品对拉传播的现状，并在比较拉美文学作品在华传播的基础上，分析当前中国文学对拉传播存在的“数量差”“时间差”“语言差”和“影响差”等失衡现象。最后，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了增强中国文学对拉传播有效性的一些建议，如加强机构和项目的规范协调以形成对拉传播合力，拓展传播渠道和推动立体合作出版，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并适时推行分流化教学，优化传播内容以增强传播效应等，以期发挥文学作为促进中拉人民相互理解和情感沟通融合剂的作用。

关键词：拉丁美洲 软实力 文化传播 立体合作出版  
文学译介

作者简介：楼宇，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葡拉美文学研究分会常务理事、秘书长。

中图分类号：H059；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17）05-0031-14

<sup>\*</sup>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5年重大项目“中拉关系及对拉战略研究”（编号：15ZDA067）的阶段性成果。

进入 21 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发展迅速,高层互访频繁,经贸关系大幅提升。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拉文化关系远远滞后于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速度,这直接影响到中国在拉美的文化软实力,乃至中国的国家形象。文学是文化的核心构成,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直抵人心的沟通力量。加强文学作品对外传播不仅迫在眉睫,而且也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本文在阐述文化软实力和文学交流关系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中国文学作品对拉传播现状,分析当前中拉文学作品交互传播面临的系列问题,并就如何提升中国文学作品对拉传播提出一些建议。

## 一 文化软实力与文学对外传播

1990 年,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率先提出了“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用以指一种常常源于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太多情况下被忽略的吸引力”<sup>①</sup>。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其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三方面<sup>②</sup>。由此可以看出,在“软实力”的最初概念里,文化和价值观是其核心要素。中国学者在引入“软实力”概念时又拓展了新的视域,赋予其新的内涵。比如门洪华教授认为,中国软实力包含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和国家形象等五个方面<sup>③</sup>。王一川教授等人则主张,软实力的核心就是文化软实力,这是一种“中国语境下或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解读”<sup>④</sup>。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尽管对于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持不同观点,但大同小异,均强调文化之于软实力的重要性。在很多情况下,软实力的文化内涵被过度强调,甚至将软实力等同于文化软实力。

进入 21 世纪以来,文化软实力成为国际学术界和各国决策者关注的焦点,中国也将文化软实力建设纳入国家政策议程<sup>⑤</sup>。2007 年,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首次明确文化是国家的一

① [美] 约瑟夫·S. 奈著,门洪华译 《软实力与硬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6 页。

② [美] 约瑟夫·奈著,马娟娟译 《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第 15 页。

③ 门洪华 《中国软实力评估报告》,载《国际观察》,2007 年第 2 期,第 15-26 页。

④ 王一川等著 《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64 页。

⑤ 马洪超、郭存海 《中国在拉美的软实力:汉语传播视角》,载《拉丁美洲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48 页。

种软实力，并将软实力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次。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国家软实力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将提高国家软实力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联系，充分说明了文化软实力之于中国国家建设的关键地位<sup>①</sup>。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增强文化软实力、加强国家形象构建就变得愈加迫切。基于此，如何加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以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提升中国海外形象，同时促进中国对世界的理解，无疑成为未来的一项关键挑战。

文学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是一国开展对外文化传播、展现本国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的重要媒介，更是让世界了解一国及其文化的主要窗口。尽管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曾表示，“叙事作品不分高尚和低劣文学，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sup>②</sup>，但本质上而言，文学作品又是无法超越国度、超越文化的，每部作品里都承载着一个国家特有的语言、文化、思想、社会和历史，都带有它无法抹掉的民族与文化的烙印。就此而言，文学作品对外传播对于输出本国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及增强外部世界对本国的认知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就其功能实现而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文学是“攫人心者也”，是“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其意盖指文学的力量可以直抵人心，让人受到刺激和感染，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构造产生巨大影响。<sup>③</sup>或许正因如此，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文化软实力与文学能动力密切相关，文学完全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性使命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其进取的空间无可限量，其发展的前景也大有可为。”<sup>④</sup>

## 二 中拉文学作品的交互传播及其特点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明清到中华

---

① 《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软实力》，新华网，2013年12月3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8013.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2/31/c_118788013.htm). [2017-06-11]

② [法] 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载张寅德选编《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页。

③ 李云雷《文学的力量在哪里？》，载《长江文艺》，2016年第3期，第139页。

④ 白烨《文化软实力与文学能动力》，载《光明日报》2014年2月17日第13版。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是一个由外国传教士、外交官等自发译介和传播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这个时期文学作品成为对外宣传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载体，主要由政府组织翻译。第三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至今，这个时期的译介和传播模式日趋多样化，逐渐形成了政府和民间共推、国内和国外合力的良性格局。中国文学对拉美的传播不仅与这三个发展阶段相一致，而且完全符合其总体特点。一方面，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总体上仍然十分有限，且主要集中于英语国家和法德两国等。而就拉美地区而言，中国文学的译介和传播明显更加滞后，其中既有地理距离遥远的因素，又有语言的巨大障碍。另一方面，外国文学作品的输入远超中国文学的海外输出，中外文学作品的传播和交流存在着严重的赤字。具体到中拉文学作品的交互传播，这种逆差更加明显。为便于更好地观测中国文学作品对拉传播的进程和规律，笔者拟从比较的视角分析中国文学作品对拉美的传播和特点。

#### （一）中国文学作品在拉美的传播

总体上来看，中国文学作品在拉美的译介和传播非常滞后，作家作品的数量和种类都很有有限。笔者选取了拉美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图书馆，对其馆藏的西班牙语版中国文学类图书进行检索，并结合在全球著名购物平台亚马逊的墨西哥站点和巴西站点上销售的西语版及葡语版的中国文学类图书情况，可以发现在拉美传播较广、受关注度较高的中国文学类图书高度集中于古代诗歌和古典名著，对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严重不足，仅有鲁迅、莫言、余华、王安忆、麦家、阎连科等为数不多的作家的作品被译介到拉美地区。就此而言，完全可以说中国文学在拉美的传播尚处于“拓荒”阶段，而且传播渠道多为间接途径，具体来看有如下特点。

首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拉美读者接触到的中国文学鲜有从汉语直译的作品。如对中国诗歌颇有研究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喜欢阅读的李白和王维等人的诗作是从法译本或英译本转译的。阿根廷著名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通过德语版《红楼梦》才了解到这部古典名著的。<sup>①</sup>这种从其他语种转译的状况直至20世纪中叶才开始略有改观，但时至今日，转译作品仍占不小比例。

<sup>①</sup> Jorge Luis Borges, “Tsao Hsue Kin: El Sueño del Aposento Rojo”, 19 de noviembre de 1937, en *Textos Cautivos*, Madrid: Alianza, 1998, p. 343.

其次，西班牙汉学家充当了中国文学通往拉美的关键桥梁。一方面，西班牙汉学家是中国文学在西葡语国家得以传播和推广的初始力量。20世纪80年代，汉语及中国研究在西班牙兴起催生的一批西班牙汉学家，开始从汉语直接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如塔西安娜·菲萨克（Taciána Fisac）曾因翻译钱钟书的《围城》和巴金的《家》等作品，于2012年获得“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sup>①</sup>，成为西班牙语国家首个获此殊荣的汉学家。<sup>②</sup>阿莉西亚·雷林克（Alicia Relinque）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译作包括《文心雕龙》《西厢记》《牡丹亭》等。另一方面，西班牙汉学家也是译介中国文学的主要力量。根据2017年3月公布的“世界汉学家数据库”显示，在全球5925位汉学家中拉美地区仅21人。<sup>③</sup>而且，拉美汉学家多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从事文学作品译介与研究的汉学家屈指可数。比较知名的有秘鲁翻译家吉叶墨·达尼诺（Guillermo Dañino），译作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为主。墨西哥学院教授莉莉亚娜·阿尔索夫斯卡（Lilijana Arsovska）则以翻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为主，如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等。

再次，西班牙出版社是中国文学进入拉美的主要渠道。一方面，西班牙出版社在全球西班牙语图书市场中所占的市场份额本身就较大。从西班牙语图书市场总体情况来看，西班牙占46%，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5国合计占45%，其他十几个国家占9%。<sup>④</sup>另一方面，相较于拉美的出版社，西班牙出版中国主题书籍的历史更悠久、种类更多、渠道也更通畅。一项关于中国文学图书在拉美地区出版状况的调研显示，从中国当代文学类书籍的出版地来看，排名第一位的是西班牙，出版的图书数量占总量的73%。<sup>⑤</sup>如世界上最大的西班牙语图书出版商西班牙普拉内塔出版集团（Grupo Planeta）旗下的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Editorial Seix Barral）出版了鲁迅和余华的大部分作品，西班牙凯伊拉斯出版社（Kailas Editorial）则出

<sup>①</sup> 该奖项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2005年设立，旨在表彰在介绍中国、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外国翻译家、作家和出版家。

<sup>②</sup> 塔西安娜·菲萨克还于1992年在马德里自治大学创立“东亚研究中心”，这是西班牙首个致力于以中国和日本研究为主的学术机构。

<sup>③</sup>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儒学联合会等“世界汉学家数据库”。<http://www.hanxuejia.net/>。[2017-06-11]

<sup>④</sup> 傅西平《聚焦阿根廷出版业》，载《出版参考》，2015年9月，第17页。

<sup>⑤</sup> 姜珊、周维等《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开拓西语市场分析——以五洲传播出版社为例》，载《出版参考》，2017年第4期，第45-47页。

版了莫言的大部分作品。

最后,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事件加速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拉美的传播。莫言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第一部作品为《红高粱家族》,是由英文版转译并于1992年在西班牙出版的。截至当前,莫言的作品中已有14部被译介成西语,其中超过半数的作品为其获奖后译介的,且多由中文直译<sup>①</sup>,而译介到葡语的作品仅有3部<sup>②</sup>。诺贝尔文学奖的宣传效应、加之莫言的文学创作又受到了拉美文学的影响,莫言的作品在拉美引发普遍关注。2015年,莫言、铁凝等作家随同李克强总理出访拉美,并与哥伦比亚作家代表座谈,再次激发了拉美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阅读兴趣。

## (二) 拉美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认知是在互动中形成的,“中国对拉美缺乏认知,或者由此造成认知错误反过来会影响拉美对华认知,制造对华负面印象”<sup>③</sup>。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提高对拉美的认识本质上有利于中国在拉美的形象建设。由此也可以推断,拉美文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可以增强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与理解,而且事实上也有利于中国文学作品对拉美的传播。

拉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是拉美文学在中国传播的初始期。这个时期共计出版图书82种,其中1950—1965年的出版数量为74种,占这一时期总量的90%。“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整个外国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处于停滞状态,拉美文学亦不例外。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对外国文学译介的选材范围。在这一背景下,引进的文学作品多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以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为主要题材。译介的作家多为左翼作家,如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巴西小说家若热·亚马多(Jorge Amado)等。出版的拉美文学作品多由俄语、英语、法语

<sup>①</sup> 莫言作品的西语版包括:穆奇尼克出版社《红高粱家族》(英文转译,1992年);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变》(中文直译,2012年);凯伊拉斯出版社《丰乳肥臀》(英文转译,2007年)、《天堂蒜苔之歌》(英文转译,2008年)、《生死疲劳》(英文转译,2009年)、《酒国》(英文转译,2010年)、《师傅越来越幽默》(英文转译,2011年)、《蛙》(中文直译,2011年)、《爆炸》(中文直译,2013年)、《檀香刑》(中文直译,2014年)、《十三步》(中文直译,2015年)、《红树林》(中文直译,2016年)、《红高粱家族》(中文直译,2016年)、《藏宝图》(中文直译,2017年)、《透明的红萝卜》(中文直译,2017年)。

<sup>②</sup> 莫言作品的葡语版中《丰乳肥臀》(2007年)由英文转译,《变》(2013年)和《蛙》(2015年)由中文直译。

<sup>③</sup> 郭存海《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拉美的视角》,载《拉丁美洲研究》,2016年第5期,第53页。

等其他语种转译而成，因为我国西班牙语专业及葡萄牙语专业分别创建于1952年和1960年，这一时期西葡语翻译人才队伍尚未形成。此外，受时代背景等因素影响，对作品的漏译、更改或删除的现象屡见不鲜。

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逐渐改善，拉美文学的译介和传播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间，共有277种拉美图书在中国出版，一时间出现拉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繁荣。这种现象之发生主要源于中国已经开始逐步进入“让政治的归政治，让文学的归文学”的新时代。文学本位的回归不仅释放了创作激情，还催生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葡拉美文学研究分会在1979年的成立。在以该分会成员为主的专家学者们的努力下，一批重要的拉美作家的作品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以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和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Vargas Llosa）为代表的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成为这个时期译介的主流，此外，博尔赫斯的作品也备受欢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奥克塔维奥·帕斯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对拉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国内西葡语教学初具规模，一批有造诣的西葡语人才投身译介工作，转译作品的比例大大减少。这一时期，共计70家出版机构参与拉美文学类图书在中国的出版，其中云南人民出版社自1987年起推出“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以来，陆续出版图书60余种，堪称拉美文学在中国传播的中流砥柱。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内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缺乏规范，直至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版权组织后，出版界的版权意识才日益加强，国内出版市场才逐渐与国际接轨。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拉关系的日益密切，国内西葡语教育日益蓬勃发展，拉美文学的译介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2000年至2017年8月共有381种拉美文学作品在中国出版，其中从2012年十八大召开至2017年8月共计出版186种，占21世纪以来出版总量的49%，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出版总量的25%（见图1）。这一方面表明，中拉关系的发展带动了拉美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同时也表明中国读者对拉美文学的兴趣日益增强。这一时期拉美文学作品的引入主要是基于市场行为。这表现在译介作品的选题标准呈现多样化特征，除了以西葡拉美文学分会的专家为主的学者眼光外，出版社的选题标准成为另一重要因素。如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Paulo Coelho）和智利作家罗伯特·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的作品在欧美市场广受欢迎，国内出版社紧跟潮流，迅速引进，在国内也取得了很好的反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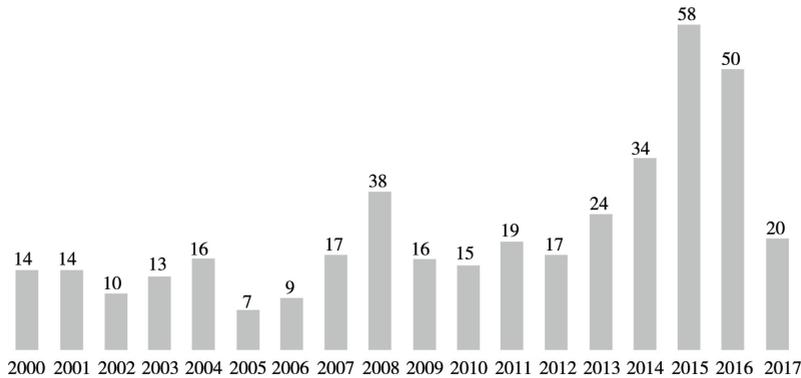


图1 2000年1月至2017年8月拉美文学类图书在中国的出版数量(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数据绘制。

总体来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中国对拉美文学作品的译介不仅数量相对较大,而且种类也相对较多。这种现象在中国改革开放前主要是政治作用的结果,但在改革开放后主要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这与中国文学作品在拉美的传播路径无疑形成了某种对比,值得深刻反思。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当前共计217位拉美作家的526种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另有65种以多国别或多位作家形式编译的选集出版。加上重版重译的作品,共计740部。共有20个拉美国家的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其中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古巴及乌拉圭8个国家的作品占总数的90%,而对拉美其他国家文学作品的引进则相对较少(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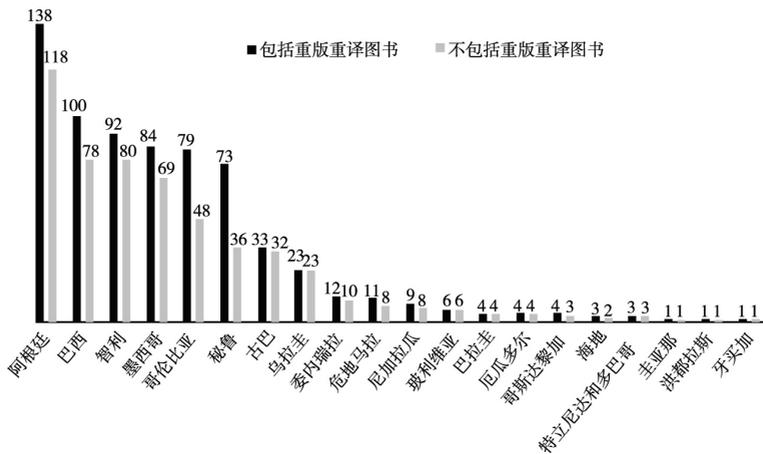


图2 1949年10月至2017年8月拉美各国文学类图书在中国的出版数量(种)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统计数据绘制。

### (三) 中拉文学作品交互传播的特点

通过对中国和拉美文学作品的译介和传播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中拉文学作品交互传播具有明显的“逆差”。这种特征除了前文所说的“数量差”之外，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中拉相互认知的“时间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中国民众眼中，拉美和中国同为亚非拉第三世界，因此对拉美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1951年，智利左翼诗人聂鲁达受命来到中国，给获得“列宁国际和平奖”的宋庆龄颁奖。聂鲁达兼具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身份，使他成为当时在中国最知名的外国作家之一，既成了“中拉友好之春的第一燕”<sup>①</sup>，也成就了拉美文学在中国的初啼<sup>②</sup>。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民众已经接触到不少拉美文学作品，对拉美也有了一定了解。但在那个年代，美国采取孤立中国的敌视政策，拉美国家普遍对中国存有较大疑虑而与中国保持距离。除古巴于1960年与中国建交外，其他拉美国家直至70年代才陆续与中国建交。因此，对大部分拉美国家的民众而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才慢慢走入他们的视野；而直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形象才逐渐从“想象”变得趋于相对可见。这种“时间差”导致了中拉民众在阅读、理解和接受彼此文学作品时的基础和水平的差异。

其次是中拉交流沟通的“语言差”。从语言本身看，汉语与西语和葡语分属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彼此之间的关联度和相似度极低。西语和葡语属于容易掌握类的外语，而汉语属于最难掌握的外语之一<sup>③</sup>。就此而言，中国人学习西葡语的难度要远远小于西葡语国家的人学习汉语的难度。从语言教学的发展状况看，拉美的汉语教学和中国的西葡语教学也存在着很大差距。中国的西语和葡语本科学历教学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目前已发展到研究生层次的学历教学。而拉美的汉语教学和推广主要依赖孔子学院和华侨学校，至今尚无一所拉美本土大学开设汉语本科学历教学。这种“语言差”导致中国的西葡语专家、译者和学生要远远多于拉美的汉语专家、译者和学生，在拉美提高汉语教学和传播可谓任重而道远。

① 黄志良著《新大陆的再发现——周恩来与拉丁美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55页。

② 聂鲁达的诗集《让那伐木者醒来》（*Que Despierte el Leñador*）是第一部翻译成汉语并在中国出版的拉美文学图书。

③ “¿Cuáles Son los Idiomas Más Fáciles y Dificiles de Aprender?”，en *ABC*，31 de marzo de 2014. <http://www.abc.es/sociedad/20140331/abci-lenguas-dificultad-201403281938.html>. [2017-06-11]

最后是中拉文学的“影响差”。鉴于中国文学在拉美的译介和传播存在一系列限制条件，中国文学在拉美的影响非常有限。关注中国文学的读者群人数不多，且大多数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仅局限于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与之不同的是，拉美文学在中国拥有一个相对稳定且仍在不断增长的读者群。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都是中国读者熟悉的名字，《百年孤独》常年位居最受欢迎的外国小说榜单。拉美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影响尤其深远。莫言、阎连科、韩少功、马原、格非等作家的创作都受到了拉美文学的启发。阎连科将拉美文学喻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催生剂，认为“其影响之剧，可能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时期的任何一个流派、主义和文学团体”<sup>①</sup>。

### 三 提升中国文学作品对拉传播的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中拉文学作品交互传播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中国文学对拉传播始终处于“入超”地位，而且就其传播的影响力和有效性而言，仍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因此，中国文学要充分发挥连接中拉民心相通的桥梁作用，可谓任重道远。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当前中拉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中拉双方均有着强烈的增进相互了解的意愿和行动，尤其是中方始终彰显其主动精神，发起了一系列倡议，提供了相应的政策支持。这无疑为扩大中国文学对拉美的传播提供了良机，笔者就此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 （一）加强规范协调，形成对拉传播合力

自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第一次提出“新文明观”以来，文明交流互鉴成为中国外交的亮点和焦点。在此背景下，中拉文化关系的地位获得大幅提升。2016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上的致辞中再次强调，“文化关系是中拉整体外交的重要一翼，要以中拉文化交流年举办为新起点，牢牢把握中拉整体合作的历史机遇，充分借鉴彼此文化成果，让中拉文明成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相互促进的典范。”<sup>②</sup>为此，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中拉人文交流的政策和倡议，其中在对外

<sup>①</sup> 阎连科著《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5页。

<sup>②</sup> 《文明互鉴，增进中拉人民友谊的桥梁》，载《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9日第3版。

出版和传播方面，既有包括拉美在内的面向全球的综合项目<sup>①</sup>，也有诸如“中拉思想文化经典互译工程”<sup>②</sup>等专门项目。这些有利的环境为对拉出版与传播提供了良好基础。

然而目前来看，这种对拉出版传播存在着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综合项目以英语图书为主，西葡语图书的比例相对较少<sup>③</sup>；另一方面，专门项目虽在进展中，但就其效率和效果而言不敢过度乐观。就对拉出版和传播而言，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切实加强三个方面的努力。其一，要完善和规范入选作品的遴选机制，努力做到“请准专家、优选作品、精选译者”。唯有把好入口，才有保障出口效果的可能性，毕竟传播的本质重在质量，而非数量。其二，目前对外项目繁多，亟待建立各项目间的协调机制，以增强对拉整体传播的质量。比如，可以探索考虑将国家汉办发起的“孔子新汉学计划”博士项目同文化部主导的汉学家和青年汉学家研修项目及上述翻译项目统筹安排与融合，以形成互补和合力。其三，对拉出版传播关键在于激发民间活力。中国政府主导对外出版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但从实际执行层面、可持续性和有效性来看，民间机构是关键主力。这就需要支持和鼓励中拉双方的高校、智库、出版社和文化传播机构之间增强交流与合作，而目前最缺乏的是交流和信息分享平台。政府相关部门在此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

## （二）拓展传播渠道，推动立体合作出版

相较于与英语国家、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交流，中拉出版界的沟通极少，基本还处于“零星对话”阶段。国内只有个别出版社有涉拉项目。如国内最早进入拉美市场且成效较好的五洲传播出版社，自2012年以来已陆续出版麦家、刘震云、王蒙、王安忆等20多位作家的32种文学作品的西班牙语版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利用外语和高校平台的优势，主打与拉美高

<sup>①</sup> 此类项目主要包括“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中外图书互译计划”（2008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年，中宣部、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出版工程”（2013年，中宣部，“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2014年，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

<sup>②</sup> 该项目由中国文化部于2016年中拉文化交流年背景下设立。

<sup>③</sup> 以启动最早、收效最大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为例，截至2016年年底，两个项目资助的西语图书前者仅占4.3%，后者约占7%，资助的葡语图书尚不足5本。参见姜珊、胡婕《不忘初心，连通中国与世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项目十年进展情况介绍》，载《出版参考》，2017年第9期，第18-20页。

校出版社的合作项目<sup>①</sup>；四川文轩出版集团则依托四川大学西班牙语系和拉美研究所的支持，新近成立了西语出版中心，主打特色出版，推广川籍作家和川蜀文化走向拉美。

尽管如此，中国对拉出版仍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初始阶段，开辟拉美出版市场仍需要稳扎稳打。首先，应积极参加拉美国际书展，尤其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国际书展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书展等，获取出版信息和合作伙伴，特别要重视与西班牙出版商的合作，利用西班牙在拉美占主导地位的出版资源和渠道“借船出海”。其次，在当前阶段，中国出版机构宜以信息共享、合作共赢为要旨，抱团开拓拉美市场。同时，各出版机构宜进行产品和市场细分，形成各自的特色和比较优势，特别要避免产品的同质性。最后，针对日新月异的出版传播形势，宜打造由版权贸易、传统出版与数字化出版、书展合作、在海外开设书店和图书专柜、联合兴办出版社等业务板块构成的“立体化”对外合作模式，不仅使产品内容多元化，而且使出版和传播渠道多元化，以提高中国作品在拉传播的复合效果。

### （三）改进人才培养模式，适时推进分流教育

语言差异是横亘在中拉文化交流之间的藩篱，更是文学作品对外传播面临的首要问题。进入21世纪后，中拉之间的“语言差”有所缩小。一方面，中国的西葡语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16年10月，全国开设西语专业的院校已达96所，是1999年的8倍；开设葡语专业的院校从1999年的2所上升到27所。<sup>②</sup> 教育部公布的2017年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开设西语专业和葡语专业的院校又分别增加了8所和2所。除高等院校外，塞万提斯学院也成为西语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据塞万提斯学院《2017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西语学习者共计31154人，其中中小学8874人，大学22280人，塞万提斯学院3166人。<sup>③</sup> 另一方面，拉美的汉语教育也有所提高。拉美地区的第一所孔子学院于2006年在墨西哥城设立，截至目前，共有20个拉美国家设立了39所孔子学院和18个孔子课堂，其中仅2015年一年，拉美国

<sup>①</sup> 据外研社综合语种分社西葡意语部主任李丹介绍，外研社已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出版社和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出版社开启合作，正在推进《中国文化读本》《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等作品的西语版出版。

<sup>②</sup> 中拉青年学术共同体、INCAE商学院《中国西班牙语人才就业和流动调查报告》，2017年1月15日。

<sup>③</sup> Instituto Cervantes, “El Español: una Lengua Viva”, Informe 2017, p. 15. [https://cvc.cervantes.es/lengua/espanol\\_lengua\\_viva/pdf/espanol\\_lengua\\_viva\\_2017.pdf](https://cvc.cervantes.es/lengua/espanol_lengua_viva/pdf/espanol_lengua_viva_2017.pdf). [2017-09-01]

家的注册学员数量就达到 35192 人。

中国西葡语学习者和拉美汉语学习者人数的不断增加，为扩大中国文学对拉传播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和更大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足以转化为对拉文学传播的可用人才，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对人才培养模式适时进行细分。比如，国内西葡语教学可根据学生学习特点和意愿，在高年级进行分流化教学，有意识地培养专业化的翻译人才和出版传媒人才<sup>①</sup>。拉美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则可以充分利用或结合“孔子新汉学计划”等项目着力培养深入了解中国的高水平汉语人才，同时特别是在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等项目中建立比较规范的人才选拔机制，加强孔子学院、智库、高校诸机构间的协调，尽最大可能将来华留学、访学、研修的名额提供给真正符合资格且适合的人选。此外，同样重要的是，亟须搭建中拉学者、译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分享平台，以便于开展合作翻译。毕竟就中国文学作品输出的质量和效果而言，最佳翻译模式无疑是中国译者和拉美译者的合作或协作翻译。

#### （四）优化传播内容，增强传播效应

中国文学走出去不是一个单向的推广过程，而是一个与海外读者进行跨文化交流和心灵对话的过程。一部作品只有走进外国读者的内心，使他们通过阅读了解中国、感受中国，进而理解中国，才能真正实现其感染力和影响力。总体来看，中国文学作品对拉传播以中国方面自我传播、主动“送出去”为主，西葡语国家汉学家或研究者自主选取、“拿走”作品进行译介为辅。从传播和接受效果看，“拿走”取得的成绩往往更为突出。究其原因，有些“送出去”的作品过分强调政治正确或者主流话语，而忽视了作品的文学性和海外读者的“他者眼光”，与市场实际需求相脱节。

因此，中国文学不仅要走向拉美，更应强调真正走进拉美。这就需要联合国内外相关机构，加强对拉美图书市场、阅读喜好和接受心理的调研，尤其要考虑到拉美国别众多、文化多元的特点，适当考虑区别化的市场战略。如以谍战题材著称的中国作家麦家的小说《解密》，在阿根廷上市不到一个月就跃居文学类销售排行榜第一名，这并非偶然，因为“没有哪种文学体裁能像侦探小说这般深深扎根于 20 世纪阿根廷叙事文学”<sup>②</sup>。再参照 20 世纪八九

<sup>①</sup> 据笔者统计，中国熟练掌握西语的在职出版传媒人共计才 19 人，分别供职于 9 家中国出版社；中国尚无熟练掌握葡语的在职出版传媒人才；拉美地区拥有熟练掌握汉语的工作人员的出版社也寥寥无几。

<sup>②</sup> 参见 Jorge Lafforgue, *Cuentos Policiales Argentinos*, Buenos Aires: Alfaguara, 1997, prólogo.

十年代拉美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效应可以发现，正是因为中国的译者和研究者了解哪些作家作品容易在中国引起共鸣，因此由他们“拿来”的拉美文学才在中国读者心中激起了广泛的反响。此外，从可持续性角度来看，当前尤其要提高对图书市场的敏锐性，勇于与拉美市场对接，同时也要学会“包装”和设计内容。比如近些年儿童书籍成为国内外出版市场的一大热点。在此背景下，应适时推出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进入拉美市场。

#### 四 结束语

纵观中国文学对拉美的传播过程和特点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政治或政府是中国文学对拉传播的主要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传播的可渗透性和可持续性。要改进这种局面无疑需要转换文学传播的动力机制，适时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市场并非是万能的，因为即使“回归文学本位”之后，文学在促进中拉民心相通、提升中国在拉美的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作用仍然有限。这在相当程度上源于既缺乏对拉文学传播的整合平台和协作机制，又缺乏对人才的精细化培养，还缺乏适合对拉传播的优选文学作品。事实上，如果在充分调研拉美出版市场、深谙拉美历史文化以及洞察读者阅读心理的基础上，再因地因人地制定适宜的传播方案，相信会取得预期的效果。但要实现这一目标着实不易，因为就目前而言中国文学对拉美的传播才刚刚起步。

(责任编辑 刘维广)

**Key words:**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 constructive development , common destiny ,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31 China’s Cultural Diffusion toward Latin America: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Lou Yu

**Abstract:** As China has developed increasingly clos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ies with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long–ignored cultural ties began to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and entered the China’s policy agenda in recent years. As for China side , the strength of cultural ties will contribute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China and Latin America , promote China’s soft power and consequently improve public perception of China in this region. Litera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of culture and considered to hold the power of touching reader’s hearts and minds. It is well believed that the diffus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ward Latin America can help achieve these goals. Based on the state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literature diffusion , the essay first mak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iffusion toward Latin America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diffusion in China , the essay goes on to present a full analysis of the imbalance of Chinese literature diffusion toward Latin America , mainly in the form of quantity deficit , influence deficit as well as time lag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ag. As a conclusion , the autho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Key words:** Latin America , cultural soft power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 literatur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45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U. S. –Cuba Relation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Realism

Lu Sihe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since Cuba’s revolution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has undergone an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from confrontation to re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levels analysis of Structural Realism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out the regularity of the development of U. S. –Cuba relation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three levels.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level , the global political environment transformed from the bipolar pattern to the “one superpower and multiple big–powers” , and then to the multi–polarization pattern. As the declining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the game between big powers ,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Hemispher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brought by the ris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wing forces , for the United States , Cuba has transited from a bargaining chip for the exchange of interest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egemonic balance of power , to a breakthrough point of strategic redeployment toward Latin America. On the national level , the confrontation and contact between U. S. and Cuba are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safeguarding their own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ir domestic development. The evolu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and the pursuits of interest groups greatly reduced the political cost of normaliz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 S. and Cuba.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 the strategic focuses and policy preferences of different policy makers evolv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n the whole , however , ideological divisions between the two